

She

Ke

Bo

Shi

CHU TANG FO DIAN CI HUI YAN JIU

初唐佛典词汇研究

王绍峰 / 著

◎社科博士论丛

Cong

安徽教育出版社

初期佛典词汇研究

◎ 陈建伟著

CHU

初唐佛典词汇研究

TANG

◎王绍峰 / 著

FO

DIAN

CI

HUI

YAN

JIU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初唐佛典词汇研究 / 王绍峰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4. 7

(社科博士论丛)

ISBN 7 - 5336 - 3782 - 8

I . 初... II . 王... III . 佛经—词汇—唐代—研究
IV . B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70265 号

策划编辑:万直纯 特约编辑:徐 敏 装帧设计:文 闻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 1 号)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远东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9.375

字 数:240 000

版 次: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2 000

定 价:18.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0551)2651321

邮 编:230061

序

方一新

王绍峰副教授的博士毕业论文就要在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十分高兴。绍峰嘱我写一篇序,开头我有些犹豫:为学生的论文写序,是否有吹捧之嫌?但盛情难却,我也就不再推辞。

绍峰是1999年秋季入学的,一同入学的还有张君诒三(现在曲阜师范大学工作)。到2002年暑假毕业,正好三年,时间真快。绍峰刚入学时,对汉语词汇史研究领域并不太熟悉,如何读书,选择什么题目,一时间颇费斟酌。好在他敏而好学,一旦框定了范围,选好了题目后,就横下心来做学问。在这三年里,原本对中古、近代汉语时期作品较少涉及的绍峰,勤奋攻读,不断钻研,完成了博士毕业论文《初唐佛典词汇研究》,在汉语词汇史研究领域交上了一份答卷。当然,这份答卷究竟完成得怎样,还得有待于读者方家的批评指正。

这部《初唐佛典词汇研究》如果说有什么特点,那么,在选题上,在考论上,都有值得一说的地方。

先说选题。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东汉以来的翻译佛经逐渐受到了汉语史研究者的重视,接连出现了利用佛典研究取得可喜成绩的著作,开掘了这块长期以来不受重视的处女地。这是可喜的进步。已有的研究多集中在先唐佛典,这是很自然的。但传世的佛典中有相当数量是唐以后翻译、撰述的,对这部分语料,以前发掘利用得不够,几乎没有什么专门的研究,存在着空白。

一般认为，唐代译经承接六朝而来，取材范围本身就受到原典的影响，加之翻译规模的扩大，参与的人员增多，一些用语都程式化了，故其反映口语的程度当不能和禅宗及宋儒语录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同样是唐代佛经，也应该区别对待。比如义净的译经，特别是他的“一切有部律”的多部译经，因其反映了早期僧团的习俗，生活气息较浓，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绍峰的论文以义净翻译的比较生活化的“律藏”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等传记作品为主要材料，首次对初唐佛经词汇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这是值得肯定的。

再说内容。本书用四章的篇幅，对以义净译经为中心的初唐佛典作了系统翔实的考论，填补了该领域的研究空白，在汉语词汇史研究方面做出了成绩。

我认为，一篇合格的博士论文，首先应该是有创见、有较多发明的论著。清代学术中坚是乾嘉学派，其中又分为“皖派”和“吴派”。我的老师郭在贻先生曾经说过，他比较欣赏“皖派”，而不太佩服“吴派”：就是因为前者是发明型的，有自己的创见；后者是纂集型的，个人创见较少。一篇博士论文，篇幅长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不是有所发现，有没有自己的见解。

这样来看，王绍峰的论文是一篇既属于系统研究，又有较多见解的文章。其内容可分为以下数端：

一是涉及的范围较广，研究较为系统，初步揭示了以义净译撰为中心的初唐佛典的面貌，为深入研究初唐乃至整个唐代的语言词汇提供了参考。

二是考释了一批口语词、佛源词和新词新义，扫除了语言障碍，为阅读、利用初唐佛典提供了方便。

三是在描写的同时，尝试进行解释工作。如用“类推”现象来解释唐代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某些词义的产生；认为“语素替换”是词汇历时演变的一种通常形式。

作者通过研究告诉我们，唐代佛典是研究唐代词汇的值得注意的语料之一，应该加强研究，抉发其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

考释语词部分主要见本书第三章，其他各章也有涉及。所释词语大抵言而有征，可补以往研究和大型辞书之阙。

对成说提出质疑，与时贤商榷，是本书的一大特点。不妨举例来说：

《敦煌变文校注·伍子胥变文》：“敕既行下，远近咸知各悉，投名争前应募。”绍峰说：“按：标点可商。或当作：‘敕既行下，远近咸知，各悉投名，争前应募。’‘各悉’即同‘皆悉’‘悉皆’。此处的‘悉’是‘都’义，而不是‘知晓、知悉’义。”（本书 59 页，下同）按照本书的意见标点，则“敕既行下”等四句都是四字一逗，文意、语气都较为顺畅允帖，可以信从。

《敦煌变文·汉将王陵变》：“王陵脱着体汗衫，掇一标记。”对这里的“掇”，刘士涛解释为“以铁烙刺”，项楚解释为“树立”，黄征认为应从甲卷作“襍”，“襍”即“缀”，为“缀”的偏旁替换字，缀挂的意思。本书作者则认为“掇”有刺、戳义，“掇一标记”“可以解释为‘刺一标记’”，也就是在地上竖立一个标记，项说近是。（104 页）

“望”原为动词，后来虚化为介词，义为向、往，表示对象或方向。有学者举六朝小说《宣验记》“遥见有七段火光，望火而走”一例，认为“望”已经是介词往、向义。本书认为《宣验记》的“望”仍然是动词，有实义。“望火而走”即眼看着火而急奔，“望”尚未虚化。类似的例子如《观世音应验记》“但望日而走”。经过探讨，作者认为“望”的介词用法到初唐才成型。（59 页）

“闷绝”一条，本书列举义净译经主语是“虫”的三个“闷绝”用例，认为说虫“昏倒”（昏厥），“失去知觉”显得牵强，“闷绝”应该解释为“窒息”，纠正了拙著《中古汉语语词例释》等几部著作的释义。（92 页）

书中对一些知名学者的观点或结论提出商榷的地方还有不

少，虽然有些条目还可以讨论，并非定论，但这种不轻信权威，敢于挑战名家的精神是值得鼓励的。

无庸讳言，绍峰的论文也有不足。某些考释或结论，还有待于推敲或补证；虽然已设专章做解释的工作，但总的来看，论文的理论探讨还显得薄弱——凡此都有待于今后做进一步的充实和提高。

绍峰是皖北阜阳人，性格直率，热情开朗。在校期间，除了完成了博士毕业论文外，还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他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在获得浙江大学的博士学位后，又锁定了更高的目标——进入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投到著名学者项楚先生门下求学，站到了一个新的起跑线上。绍峰所在的阜阳师范学院很重视他，在读博期间就给他评了副教授，现在又支持他继续深造。我想，凭着绍峰的资质和勤奋，有名师指点和单位重视，他会脱颖而出，更上一层楼的。

2003年8月于杭州

目 录

序/方一新	1
第一章 概说.....	1
第一节 初唐佛典文献简述	1
一、初唐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概貌	1
二、初唐在汉语史上的地位	4
三、初唐佛典文献概况	6
四、关于义净	9
第二节 初唐佛典校读	11
一、初唐佛典校补.....	11
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南海寄归 内法传校注》校补	19
第二章 初唐佛典词汇研究的价值	34
第一节 初唐佛典的训诂学价值	35
一、佛理解说.....	35
二、涉佛语词说解.....	38
三、全民语词训诂.....	40
第二节 初唐佛典词汇在汉语史上的价值	46
一、通过比较看初唐佛典在汉语词汇史上的地位.....	47
二、初唐佛典在汉语词汇史上的价值.....	52

第三节 初唐佛典词汇与辞书编纂	65
一、初唐佛典词汇系统与辞书编纂	65
二、望“佛”生训	74
三、《唐五代语言词典》补	79
第四节 初唐佛典词汇研究与古籍整理	97
第三章 初唐佛典词汇研究(上)	115
第一节 初唐佛典中的新词新义	115
第二节 初唐佛典语词考释	139
一、考释类	139
二、释补类	180
第三节 佛源词一组	208
第四章 初唐佛典词汇研究(下)	238
第一节 初唐佛典词汇的构词理据与考源	238
第二节 类推是词义变化的基本规律	257
第三节 语素替换是词汇历时演变的一种 通常形式	278
主要参考文献	288
后记	293

第一章 概 说

第一节 初唐佛典文献简述

一、初唐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概貌

本文所说的“初唐”，指开元之前，具体而言，就是唐王朝建立后至公元713年以前的时期。因本文主要考察的语料以义净作品为主，所以我们对时段的划分也是以义净生卒年作为主要依据的。义净卒于713年，而713年恰是李隆基改元“开元”，随之而来的就是“开元盛世”，故此，本文权且把“初唐”限定在开元以前，所考察的其他佛典的译作者活动时间与义净比较一致。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社会取得了全面的发展；初唐更是一个特殊的时期，短命的隋朝刚刚结束，唐王朝还处于休养生息阶段，统治者表现出了博大的胸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快发展，出现了“贞观之治”“永徽之治”，封建社会极度繁荣。武周时代，社会依然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这从武则天统治时期的人口数量上就可以看得出来；^①文化方面也全面繁荣，出现了大唐气象：科学技术方面有杰出的天文历算家傅仁均、李淳

^① 《唐会要》卷八四《户口数》载，永徽时唐人口是380万户，到武周结束时，已增至615万户。

风，名医药圣有孙思邈以及孟诜、许胤宗、张文仲等；人文方面也是气象日新，宗教领域百花竞放，呈现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独特景象：景教、摩尼教、祆教、伊斯兰教、道教、佛教纷纷登台，竞相上演宗教文化的好戏；本土的儒学，也出现了系列集大成之作。

谢弗在《唐代外来文明》一书中有一段颇富激情的叙述：

七世纪是唐朝征服和移民的世纪。……七世纪是一个大迁徙的时代，这时有大批的移民迁入了现代中国的中部和南部地区，他们将这些地区看作是寻求新的机遇的地方，这里在他们心目中也是有可能存在着大批财富的地方，当然他们之所以涌人这些不发达的地区，也是为了逃避征募、洪水以及野蛮人的入侵。七世纪又是一个社会变革的时期，来自南方的地方士人通过正式的科举制度确立了他们的政治地位，而这一切都是以牺牲北方旧贵族及其与突厥文化的传统联系作为代价来实现的。在七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即武则天皇后和她的昙花一现的周帝国统治时期，这种变革达到了顶峰时期。七世纪也是一个印度文化大量入侵的时期，伴随着印度天文学、数学、医学以及语言学等学科的涌入，佛教哲学在这时已经渗透到了唐朝上流社会的生活之中。最后，七世纪还是一个崇尚外来物品的时代，当时追求各种各样的外国奢侈品和奇珍异宝的风气开始从宫廷中传播开来，从而广泛地流行于一般的城市居民阶层之中。^①

看来“七世纪”确乎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世纪。本文是以初唐佛典为研究对象，所以我们要特别说明一下宗教方面的情况。当时

^① [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14页。

统治者的宗教政策使得宗教发展达到了它的黄金时期。季羡林先生在其主持的《大唐西域记校注》“玄奘与《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中从六个方面论及了人主对待宗教的策略完全是取决于该教是否对自己有用。“所谓有用，包括六个方面：一，哪个宗教拥立了自己？二，哪一个宗教对眼前或将来的统治有用？三，哪一个宗教能为自己的门楣增光？对调整品级结构，抑制名门大族，抬高庶族地位，确定族望与官品相结合的等级结构有用？四，哪一个宗教有利于扩大版图？五，哪一个宗教有利于长生不老？六，如果是一个女皇，哪一个宗教能抬高妇女的地位？”^①这里季先生充分解析了初唐几个帝王——高祖、太宗、高宗、武后的心灵，指明了初唐宗教繁荣的历史原因。初唐宗教的繁荣还和整个大唐气象有一定的关系，此时的一些较小的宗教流派也都纷纷登场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当然，从南北朝时发展起来的佛教更加受到唐代皇室和贵族的尊重，王邦维先生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说：“唐王朝这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极为强大，文化事业极一代之盛。由于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提倡，佛教也得到很大的发展。”^②对原典的崇敬、对佛教原生地的向往也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法显、玄奘、义净，是中国历史上西行求法的佛教徒中三位最杰出者，前一位出现在东晋，后两位却都出现在唐初”。^③此时佛教本土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佛教信仰和佛教文化也深深渗透到人民大众之中，俗讲、变文等很是流行，这一外来宗教——佛教

^① 《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1版

^{②③}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年第1版，第1、2页

终于达到了和中国人精神生活休戚与共的地步。”^①由任继愈先生总主编、杜继文主编的《佛教史》也说：“佛教文化作为唐代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达到了鼎盛阶段。在隋代佛教宗派形成的基础上，入唐后又相继建立起许多新的宗派。这些宗派有高度发展的寺院经济作支柱，创造了各自庞大的理论体系，代表了当时哲学思维的最高水平，影响着大批士人，左右时代思潮；而佛教的进一步普及化，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使佛教的某些基本教义也变成了大众的观念。”^②也就是说，佛教已深入唐人的精神世界，我们在解读唐代文化时，佛教是最不容忽视的宗教背景。

唐代佛教既有如此深远的社会影响和历史意义，它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当然，宗教学、哲学、文学、文化史都已经走到了前头，汉语史研究以前多着力于禅宗文献，如《坛经》等，对于初唐时期佛教典籍人们似乎不太措意。谢弗的高度评价促使我们要从佛经文献出发来探讨一下这个“七世纪”的语言形态。

二、初唐在汉语史上的地位

关于汉语史的分期问题，王力先生、吕叔湘先生都有过很好的意见，胡明扬先生认为可以从隋末唐初划界，此处不再征引。杨建国也主张“将唐一代整个包括在近代汉语之中，不必单单限在晚唐五代”。^③ 关于这一问题，特别是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的划界问题，蒋冀骋先生的意见颇可信从。蒋先生《论近代汉语的上限》^④

① [日]镰田茂雄著，郑彭年译：《简明中国佛教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183页。

② 任继愈总主编、杜继文主编：《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277页。

③ 杨建国：《近代汉语研究》，黄山书社，1993年第1版，第4页。

④ 文载《古汉语研究》，1990年第4期、1991年第2期。

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论证了晚唐五代语言中的新质因子，从而论定“近代汉语的某些语言现象也许在唐初，甚至魏晋时期就已出现，但不能执此将近代汉语的上限推到六朝或隋唐”，其说是。

方一新师于1989年在其博士论文中初步提出了“中古汉语”的说法，方师云：“可不可以把‘近代汉语’以前的‘古代汉语’一分为二，析成‘上古汉语’与‘中古汉语’两块，前者指的是先秦、秦汉的书面语言及历代模仿它的典范作品的语言，后者指的是自东汉到隋约五六百年间含有较多口语成分的作品的语言。也就是说，用‘上古汉语’来代替原来所说的‘古代汉语’，用‘中古汉语’来代表东汉以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富含口语作品的语言，以示与典范的文言作品相区别。”^①方师的这一观点在其后与王云路师合著的《中古汉语语词例释》^②、《中古汉语读本》^③中都有进一步的申述。“或曰：唐以前分属上古汉语、中古汉语；晚唐五代以后属于近代汉语，那么，初唐、中唐属于哪一段呢？依个人之见，整个唐代似都应属于近代汉语。”^④随着研究的不断进展，方师又提出了“初唐为中古汉语至近代汉语的过渡”的观点。我们在黄笑山先生的博士论文《〈切韵〉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统》^⑤中也读到几乎同样的观点。此外，或许唐“安史之乱”造成的中原地区人口的伤亡和外逃以及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迁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我们不敢说它能证明

①④方一新：《〈世说新语〉语词研究》，杭州大学博士论文，1989年10月，第13、14页。

② 王云路、方一新：《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版。

③ 方一新、王云路：《中古汉语读本》，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版。

⑤ 黄笑山：《〈切韵〉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统》，（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

什么,但是在语言的演变中,语言使用者这个因素的变化应当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方一新师在《20世纪近代汉语研究概说》一文中说:“我们可以给‘近代汉语’下一个大致的定义:所谓‘近代汉语’是指晚唐五代以至清初的汉民族使用的书面文献(主要指以比较接近口语的语汇写成的作品)语言,它的上延可以到初唐、中唐,下延可以到清代中期。‘近代汉语’上承上古、中古汉语,下启现代汉语,是汉语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①故此,本文行文之前拿出一点篇幅对这一问题表明我们的看法。同时我们认为,初唐既值中古与近代汉语转折点,属于两不管地带,这种转型期的语言问题应当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似乎值得探讨一番。

三、初唐佛典文献概况

唐代的佛典文献,真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此时的佛经翻译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出现了所谓的“新译”,大量的翻译佛经纷纷涌现,佛经翻译史上的四个大师,在初唐就出现了两个:玄奘和义净。佛教也大踏步地中国化了,本土高僧的撰述、经文注疏不胜枚举。我们考察的初唐佛典文献包括译经和撰述两个部分。译经部分(以人来分类),包括义净翻译的全部佛经,其他如阿地瞿多、宝思惟(阿弥真那)、地婆诃罗、佛陀波利、波罗颇密多罗(光智)、实叉难陀、提云般若以及玄奘的部分译经;个人著述包括义净、玄奘、慧立、彦悰、道世(其所集辑慎用,一般不直接作为考察对象)、道宣、法琳、慧净、吉藏等。依据的本子主要是日本的《大正新修大藏经》以及《续藏经》,尽管国内已有《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编印出版,但因笔者在阅读时首先使用的是《大正藏》,故此不以《中华大

^①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简报》,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主办,2001年第1期。

藏经》为据。其实《中华大藏经》较《大正藏》有诸多优点,特别是其以影印的形式出版,而且在校勘方面也提供了较多的版本可供参照,应当是文献语言研究的善本,但因上述的原因,笔者未能以此作为工作底本,而只是在校勘时偶尔使用一下,这实在是很遗憾的事。^①

附:《初唐佛典词汇研究》主要考察作品一览表

译(著)者	作品名	卷数
义净	全部作品	286
阿地瞿多 (无极高)	陀罗尼集经	12
阿弥真那 (宝思惟)	佛说浴像功德经	1
	佛说校量数珠功德经	1
	大陀罗尼末法中一字心咒经	1
	观世音菩萨如意摩尼陀罗尼经	1
	观世音菩萨如意摩尼轮陀罗尼念诵法	1
	不空绢索陀罗尼自在王咒经	3
	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	1
	大方广菩萨藏经中文殊师利根本一字陀罗尼经	1
	那罗延天共阿修罗王斗战法	1
地婆诃罗	方广大庄严经	12
	大方广佛华严经	1
	大乘显识经	2
	大乘百福相经	1
	大乘百福庄严相经	1
	证契大乘经	2
	大乘密严经	3
	佛说造塔功德经	1
	大乘四法经	1
	佛说菩萨修行四法经	1

① 据日本学者石塚晴通先生介绍,在日本,研究佛教一般依据《大正藏》,而若进行语言研究则一般依据较好的其他本子。此说见2001年9月25日召开的“第二届中古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杭州,浙江大学)本人的会议记录。